



05-4506832



pustaka.upsi.edu.my



Perpustakaan Tuanku Bainun
Kampus Sultan Abdul Jalil Shah



PustakaTBainun



ptbupsi

公共话语与思想：《墨子》与《韩非子》的关系

WACANA AWAM DAN KONSEP IDEOLOGI: HUBUNGAN ANTARA PROSA
MO TZU DAN PROSA HAN FEI TZU

郑国俊

TAY KOK JUN



05-4506832



pustaka.upsi.edu.my



Perpustakaan Tuanku Bainun
Kampus Sultan Abdul Jalil Shah



PustakaTBainun



ptbupsi

TESIS DIKEMUKAKAN BAGI MEMENUHI SYARAT UNTUK MEMPEROLEH
IJAZAH SARJANA SASTERA (BAHASA CINA)
(MOD PENYELIDIKAN)

FAKULTI BAHASA DAN KOMUNIKASI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2018



05-4506832



pustaka.upsi.edu.my



Perpustakaan Tuanku Bainun
Kampus Sultan Abdul Jalil Shah



PustakaTBainun



ptbupsi



谢

曾经放眼两年完成硕士学位，最终在 5 年后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比起学士学位阶段，硕士研究生活是相对寂寞与现实的。寂寞的是，在一条路上，也许很多人无法理解自己为何要花么 么 时间去完成一个对他们而言“简单”的硕士学位；寂寞的是，也许有人好奇为何自己要在马来西亚样的国度择样的 目来自讨苦吃；寂寞的是，当夜深人 之余，看着学士毕业后的同学或朋友在各自的路上开创一片天地，而自己 在为论文当中的某一段或某一句内容苦苦烧脑。另外，所谓的现实，是修硕读研 一定要有宽裕的经济能力，样才能真正的悠游涵泳在知识的海洋 ；现实的是， 工作 修硕自然 要更强大的自律能力，才能兼 彼此，完成学业之余不耽误工作，甚至家庭；现实的是，自己缺乏 样的自律，因此常常 在焦虑的情绪 ， 此失彼。

然而， 条路上， 了寂寞与现实，也少不了温暖与觉悟。在 条路上， 先必 感激论文导师许德发博士的指导。无论在搜寻资料或书写论文中，许老师给予了无数的建议，并耐心地引导我完成论文。虽然因为种种因素导致论文书写的 程不利，但老师依旧没放弃地用心指导。此外，老师对于我生活状况也给予大力的支持，在最 熬的 段 ，一份大学兼职、一杯 后的奶茶，在心灵上给了更多的动力。在人生 茫上，一句“坚持原则”，宛如学术上的原则精神，大大坚定自己在人生路上的 择。曾经，自己想 若让自己写一篇“如果再让我 读一次研究生”，我自己会如何去书写。我想， 了在研究上会更坚定与自律以外，我必然会 择再此体 修硕生涯上的人生百味。我始终认为，在学术之外，作为人的个体，必 要对生活、与社会有更多的接触与互动，才能在学术之旅中，完善自己的思维，并讲学术实践于生活之中，如墨子在<修 〉所言：“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最后，我也借此感激一直在 伴我的太太，因为她见证了我在 条路上的点点滴滴，也 伴我走 了修硕的甜 苦 。





摘要

墨翟的学说作为先秦时期的两大显学之一，却在先秦后期式微。追究其式微原因，学界中早已有定论。然而，墨翟的学说对战国中后期诸子的影响在战国后期百家合流的趋势中产生作用。韩非作为战国后期思想集大成者，其思想渊源可说极为复杂。本文借用了本杰明的“公共话语”概念，用以探索墨翟和韩非这两人之间的学说中出现的关键词语或相似的词语。其中一些关键词语如“规矩”与“绳墨”出现在两人的学说中，并且都是用于探讨相似的课题，比如“法”的概念。韩非作为后来者，其学说可见于其批评墨翟思想的部分。本文更透过三个主要思想的分析，即：“法”的概念、执政的概念和贤人观，发掘韩非在批评墨翟之余，其实也吸纳与改造了墨翟学说，以使其学说对战国后期的局势更具针对性。本研究最终成果，即以韩非与墨翟之间的个案，证实了战国后期百家合流对战国后期诸子思想上的冲击与影响。





WACANA AWAM DAN KONSEP IDEOLOGI: HUBUNGAN ANTARA PROSA MO TZU DAN PROSA HAN FEI TZU

ABSTRAK



Kajian ini bertujuan untuk menganalisis hubungan antara prosa Mo Tzu dan prosa Han Fei Tzu dengan menggunakan wacana awam sebagai medium untuk mengkaji isu-isu dan terma yang dibincangkan dalam kedua-dua prosa ini. Kaedah penelitian kepustakaan telah digunakan dalam kajian ini, dan data dianalisis dengan menggunakan kaedah analisis teks. Selain itu, teori Lingkaran Hermerneutik diaplikasikan dalam analisis teks demi mendapatkan interpretasi teks yang tepat dan sahih. Dapatan kajian ini menunjukkan terdapat hubungan antara prosa Mo Tzu dan prosa Han Fei Tzu. Han Fei Tzu telah menyerapkan konsep Fa, konsep pentadbiran dan konsep orang mulia dalam prosa Mo Tzu. Han Fei juga mengubahkan konsep-konsep tersebut untuk bersesuaian dengan keadaan zaman akhir pra-Qin. Kesimpulan daripada kajian menunjukkan bahawa ahli-ahli falsafah pra-Qin telah menyerap konsep daripada aliran lain. Ahli falsafah zaman akhir pra-Qin juga dipengaruhi oleh ahli falsafah zaman awal pra-Qin melalui wacana awam yang wujud dalam zaman pra-Qin. Implikasi kajian ini menunjukkan bahawa sesuatu pemikiran dan fasalah terbentuk melalui interaksi antara pelbagai aliran dengan berlatarkan konteks sejarahnya. Hal ini boleh dijadikan sebagai inspirasi kepada masyarakat berbilang budaya kontemporari.





COMMON DISCOURSE AND IDEOLOGY: RELATIONSHIP BETWEEN MO TZU'S PROSE AND HAN FEI TZU'S PROSE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 Tzu's prose and Han Fei Tzu's prose by using Common Discourse as a medium to figure out issues and terms discussed in both proses. Library research method was used in this study, and data were analysed using text analysis. Hermeneutic Circle is adopted into text analysis to obtain the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texts.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Mo Tzu's prose and Han Fei Tzu's prose. Han Fei had incorporated Fa's concept, concept of administration and concept of great person of Mo Tzu's prose. Han Fei also modified those concepts to adapt the situation of late pre-Qin period. As a conclusion, philosophers of pre-Qin period were incorporated concepts from other schools. Philosophers of late pre-Qin period were also influenced by philosophers of the early Pre-Qin period through Common Discourse which exist during Pre-Qin period. The study implicated that a thought and philosophy was form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schools with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can be an inspir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society.



目录

	页数
个人申明(PENGAKUAN)	ii
版权说明(PENGESAHAN)	iii
致谢	iv
05-4506832 摘要	v
ABSTRAK	vi
ABSTRACT	vii
目录	viii
图示目录	xii
1.0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
1.2 研究问题	6

1.3	研究目的	10
1.4	研究意义	10
1.5	研究范畴	12

2.0 文献回顾

2.1	先秦环境与公共话语的研究	16
2.2	有关《墨子》与《韩非子》的研究	22
2.3	小结	26

3.0 研究方法

3.1	研究框架	29
3.2	研究设计	31
3.3	文献分析方法	32

4.0 公共话语的形成：墨翟和韩非的背景

4.1	公共话语与先秦思想的环境	35
4.2	墨翟的生平与学术背景	47
4.3	韩非的生平与学术背景	51
4.4	小结	56

5.0 《墨子》的“法”、执政与贤人观

5.1	先秦政治思想与墨翟“法”的渊源	59
5.2	《墨子》的“法”与“天志”	67
5.3	《墨子》的执政概念与“尚同”	76
5.4	《墨子》的贤人观与“尚贤”	84
5.5	小结	94

6.0 韩非对墨翟思想的批判吸收、与改造

6.1	韩非对前人思想的批评与继承	96
6.2	韩非对墨翟思想的吸收与改造	104

6.2.1	《韩非子》的“法”	107
6.2.2	《韩非子》的执政概念	116
6.2.3	《韩非子》的“贤人”观	122
6.3	小结	127

7.0 结论

7.1	《墨子》与《韩非子》的关系	131
7.2	局势的变化与诠释学循环	140
7.3	未来研究建议	144

参考文献

147

附录

图示目录

图示	页数
3.1 以“公共话语”概念分析《墨子》与《韩非子》思想关系的研究框架	30
3.2 文献类型	31
3.3 分析文献的“诠释学循环”	32



第 1 章

绪论



公元前 221 年之前，当时的古中国涌现了大量的思想家，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百家争鸣”时期。对此现象的起源，葛兆光（2009）认为是因为“周王朝的实力与威望的衰退与周边诸侯国的兴盛，这种过去被垄断的思想权力逐渐分散。在各诸侯国里出现了一大批类似于过去王宫的文化人”。诸子们除了提出各自的思想，也会彼此间互相抨击。到了战国末期，“百家合流”现象和稷下



学宫的出现，象征了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除了互相抨击以外，也会吸纳他人的思想并融入自己的思想之中。本论文所欲探讨的《墨子》与《韩非子》，便是两本各自处于“百家争鸣”到“百家合流”的思想作品。本论文着重于分析韩非作为后来者如何吸纳、消融与继承墨翟的思想。

1.1 研究背景

一直以来，儒、道两家学说被认为是中国的显学，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柱梁，而十家九流的学派之一——墨家——在秦初到清朝时期，都处于一种式微的情况。直到清末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导使当时的中国社会呼吁变革以振兴国家，墨家才重新被挖掘出来并受人重视。郑杰文（2001，pg73）在《中国墨学通史》中就提到，

梁启超运用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把墨学纳入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经济、宗教、逻辑等部门来分析、阐述，并初步探求了其具体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使古代墨学具有了现代思想学术流派的某些特征。这一体例对以后研究《墨子》的学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01，pg73）

因此，清末墨学的复兴让后世的人发觉了墨家思想的重要性，也让后来的学者能更进一步地研究墨翟与墨家。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实际上墨家和儒家思想才是先秦时期的显学。这一点，可以从韩非的《韩非子》〈显学〉篇中看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此外，



何炳棣（2010）在清华所演讲的〈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迷——重建秦墨史实入手〉中提到了这么一句——“墨者原有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清补良药，竟被时代巨变无情地化为本身生命的强酸消融剂，这是国史和人类史上值得讴歌赞叹的永恒悲剧！”。¹墨家在先秦时期是对整个社会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学派，但是它在推动了秦的一统后，自身却几乎成为绝学。何炳棣的演讲中提到墨家与秦献公的关系密切，推断墨家入秦可追溯到第三代钜子腹䵍，即秦献公时期。当时，墨家就有不少墨者为秦工作，尤其在守备城门方面，而且当时的秦国符合墨家协助的条件，那就是所谓的“弱国”。何炳棣也认为，秦国变法最重要的“连坐”与“户籍”，实际上也深受墨家“尚同”的影响（2010，pg6）。不过，墨家只是在组织形式上消失，墨翟的《墨子》思想精髓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后人的思想。对于这一点，钱穆（1930，pg77-78）在《墨子》中就认为墨子的思想已经被各学家各子所认同吸纳，各家如孟子等诸子在批评墨子的思想之余，实际上在局部上接受了墨子的思想，并且推广它，成为墨家的“代售处”（1931，pg77）。

韩非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之一，更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于法治的理念受秦王重视，最终被李斯与秦王运用以发展秦国。正如前述，从墨家帮助秦国一统天下，到秦王运用法家的法治理念发展国家这样的历史来看，本论文认为墨家和法家也许有着某些思想上的渊源，所以才在秦国一统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必须注意的是先秦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大环境，如葛兆光所言，

¹何炳棣：〈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迷-重建秦墨史实入手〉，北京清华大学历史演讲，2010年5月13日，载于2010年6月10日《金华日报》的第D06版。



一个动荡的时代，常常是人们对既定的价值发生疑惑，时时变动的秩序，则往往使人们对固有的结构产生疑问，“天经地义”本来说的是无需怀疑的道理，但是“天崩地裂”则使这些不言而喻的道理失去了基础。(2009, pg82)

基于先秦时代的战乱与社会秩序混乱，人们自然而然对原本的人生价值和社会结构产生怀疑。因此，在这样的特殊大环境底下，诸子所提出的思想理念，都离不开当时社会的公共课题。这是因为诸子们都希望透过自身的学说，能拯救已经“礼崩乐坏”的社会。

雅思贝（1953）在其书《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提到，世界在公元前 800 至公元前 200 年有了哲学的突破，他称之为“轴心时代”（Axial Age）。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各种哲学、思想纷纷涌现，证明了当时的社会人性正进行全面的精神化（雅思贝，1953, pg9-10），而恰好先秦时期正是处于中国文明的这个“轴心时代”。不过对此“轴心时代”论，余英时（2000）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强调古中国的“突破”其实和以色列与希腊不一样，诸子的思想在超越之余，并没有和过去完全切断。

以整个“轴心突破”为比较参照，我强调中国古代的“突破”有其独特的取径。儒、墨、道都是“突破”了三代礼乐传统而兴起的。而所谓礼乐传统则包含着很大的“巫”文化的成分。这三家都曾与“巫”的势力奋斗过，最后“扬弃”了“巫”而成就了自身的“超越”。这是为什么

它们一方面致力于消除礼乐传统中的“巫风”，另一方面又对礼乐本身作了新的阐释。它们的“超越”不是与礼乐传统一刀两段。（pg397）

换句话说，先秦诸子并没有完全摒弃过去的礼乐；相反，他们致力于重新阐释礼乐。先秦社会在经历了周朝礼乐崩坏之后，更持续了约 500 年秩序混乱与战争不断的局面，可说是各种混乱局势所形成的特殊环境。

由于诸子所提出的思想理念皆为对应此一混乱的时局，因此难免受到当时社会情境的影响。葛兆光（2009）在其《中国思想史》中，就把百家争鸣的现象与三种话题，即宇宙时空、社会秩序和个人存在联系在一起。葛兆光（2009）提到，战国时期人们对于大自然规律有更进一步的认知，如对于南北自转幅度的不一样；对所居住的大地想象为“井”字，因而有“九州大陆”之说；也有对时间流逝的探讨，这一切都与“宇宙时空”课题相关。这一切有关种种“宇宙时空”的论述，更成为了一部分思想家透视一切的思路起点（pg154），比如“道”、“阴阳”、“五行”等论述。至于“社会秩序”这一课题，葛兆光则提到先秦社会秩序的大乱有三大因素，其中第一原因归咎于上层王侯的嗜欲膨胀；第二原因为当时交通发达所引发的交流与冲突；第三原因则是礼乐崩坏的后果（pg158）。不过，葛兆光认为当时的儒者认为社会大乱的主要根源是“礼乐崩坏”，失去了社会秩序，因此“重新恢复或建立秩序，不仅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而且是权力占有者的关心点，自然也是战国中期以后思想家极为热衷的中心话题”（pg158-159）。当时的社会混乱迫使诸子都在寻求一套能够回复社会稳定的秩序，从老子的“天道”、儒家的“伦理”、墨家的

“天志”到法家的“法”，都是在探讨建立社会秩序的课题。对此，本论文欲引用学者本杰明·史华兹也提出过的看法，他提出一个“公共话语”(common discourse)的概念。史华兹认为当时存在着一整套术语词汇，是属于公共的财富，同时也是当时大家共享的观念，比如：性、气、心。虽然说史华兹的“公共话语”概念可以延伸到诸子所关注的不同课题，但仅以“性、气、心”这三个关键术语来说，恰好与前面所提及葛兆光的“百家争鸣的现象与个人存在”有着关联的地方²。综合以上来看，本论文相信诸子百家在先秦时代这特殊的环境下，必然有着共同探讨的课题，并且使用着一些关键术语。

因此，本论文对于《墨子》和《韩非子》这两个与秦朝有着关系的作品产生了一个想法：墨翟与韩非的这两本作品，是否有着思想渊源呢？从混乱的社会到一统的秦朝，除了武力上的压制以外，另一个重点在于社会也重新建立了一套社会秩序并且从混乱走向稳定。本论文认为这样的一套秩序，其实就属于葛兆光所提及诸子关注的课题之一——社会秩序。为此，本论文尝试从三个切入点来探索墨翟与韩非思想中的秩序观念，其中包括“法”，执政概念和贤人观。本论文认为这三个切入点与社会秩序有着紧密的关系。

1.2 研究问题

² 葛兆光提及的“个人存在”课题，说的正是战国时期诸子对于“人”存在的探索，比如生命的永恒存在或人在现实社会的存在作用（pg179）。葛兆光提及的战国时期诸子关注“个人存在”课题，与史华兹的公共话语看似无关联，然而史华兹公共话语中诸子用所谈论的关键术语“性、气、心”，其实就属于“个人存在”的范畴。



有关墨子与韩非子思想之间共同点的研究，在此前已有学者进行探讨。周富美（2008）在《墨子、韩非子论集》中的〈韩非思想与墨家的关系〉就有对“法的观念”，“贵公-用、利与权”、“尚同、尚贤”进行分析。有别于周富美的方式，本论文以三个切入点来探讨《墨子》与《韩非子》这两本书中的思想渊源。其中包括了“法”的概念，执政的概念，和贤人观。为何选择这三套标准来分析呢？主要如前文所说：先秦时期是一个混乱与战争不断的时代，而这三个切入点与当时诸子所关注的课题，也就是社会秩序息息相关。

然而，墨翟与韩非生卒差距约 170 年，他们之间的思想如何交流呢？为此，本论文借用了本杰明·史华兹的“公共话语”，以此概念来假设墨翟与韩非处于相同话语的语境。因此韩非能够从墨翟留下的思想记载中，对墨翟的思想进行沟通。既然同处于同一个时代、同处于一个大环境下，《墨子》和《韩非子》内容中难免有着相似的共同点。因此，探析《墨子》和《韩非子》之间存在共同点是具有可行性的。为具体找出两本作品的共同点，除了参考前人的研究外，本论文还必须以什么作为证据来证实呢？那就是以《墨子》与《韩非子》文本上的文字作为分析的标准。当然，文本中的共同点并不能具体说明《墨子》与《韩非子》的关系。本论文会以韩非作为后来者的角度，并结合战国初期与后期的局势差异，来剖析韩非如何对墨翟的思想进行吸纳与消融，从而理出墨翟与韩非的思想渊源。



本论文在分析墨翟和韩非的思想上共同点之后，将进一步追问他们的思想渊源。³为此，本论文打算从“法”的概念作为第一个切入点。首先，对于“法”，墨翟的〈天志篇〉中就提到：

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员，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
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清·孙诒让注，pg195）

墨翟认为人必须有“明法”，就好比木匠有矩来衡量长度。人的一切行为需要有一个像“矩”那样的“法”作为标准。巧妙的是，韩非在其〈用人篇〉就提到这样的说法：

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陈奇猷注，pg542）

韩非认为要治理国家，就必须有法，而人人依照法的标准来行事。若国家无法，就好比木匠没有规矩尺寸，无法做好轮子或手工活。从这两本书的内容来看，两者对于法的基本概念上是具有共同的，而且不约而同使用了“法”，“木匠”和“规矩”这三个的术语。本论文第二个切入点则是执政的概念，对于执政方面，《墨子》的〈尚同〉篇与《韩非子》的〈有度〉篇都提到了集权的概念。〈尚同〉中：

³根据孙诒让《墨子闲诂》〈墨子年表第二〉考证，墨翟的出生年份约在公元前 468 年。而陈奇猷在其《韩非子新校注》〈韩非生卒年考〉中认为，韩非出生年份约在公元前 280 年。



天子立，以其立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辨，不可一二而明之，故划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以立，以其立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pg75）

这一段说明了《墨子》对于整个执政阶级结构的细分，其中最高权力者是天子，这其实就是集权的概念。而《韩非子》的〈有度〉篇，则说到：“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pg99）。一句“顺上之位，从主之法”也显示出其以君王为主的集权概念。从这点来看，《墨子》与《韩非子》对执政制度的标准有着相似的立场，那就是君主集权。当然，对于集权概念的细节差异，本论文将在随后的章节中一一探析。第三个切入点则是贤人观了，本论文以贤人作为切入点是因为“贤人”是执政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以此作为分析墨翟与韩非思想的第三个切入点。进一步来说，一个国家具备了合适的执政概念时，必然还需要合适的人来作为实行者去实践。对于贤人观这一点，无论是墨翟还是韩非的思想中都有阐述。因此，作为切入点去探索两人的思想自然也合适。《墨子》的〈尚贤〉篇就主要针对“贤人”这一点来说明“贤人”该有的标准。而《韩非子》的〈用人〉和〈人主〉则提到了“贤君”和“贤臣”该有的标准。至于具体的思想分析，则留到之后的章节再详谈。透过这三个切入点，本论文能够分析出两人对于重建或恢复社会秩序上的共同点。当然，本论文并不否认两人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差异，不过希望透过这样的一种分析方式，能从韩非的思想中找出与墨翟的一些渊源，并以这一点来论证战国后期



“百家合流”对当时诸子的影响。最后，本论文欲追问韩非在“百家合流”的影响下，如何对前人思想进行吸纳、消融与继承，从而形成如韩非这样的思想集大成者。

1.3 研究目的

本论文要探讨《墨子》和《韩非子》的目的有数个：第一，了解《墨子》和《韩非子》之间的思想渊源。这也将是最主要的研究目的。此外，借助本杰明“公共话语”的概念来假设墨翟与韩非处在相同的公共话语，韩非得以墨翟的思想进行交流。为此，本论文选择了社会秩序为核心课题，并从三个切入点，

即“法”、执政概念和贤人观来分析墨翟与韩非的思想关系。

如前文提到，墨翟和韩非的生卒差距约 170 年，因此韩非在继承墨翟思想之余，也会因时代环境的不同而做出变化。本论文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变化关系来探索战国初期到战国后期的思想变化的关系。唯有通过这样的变化关系，本论文才能更好地厘清墨翟与韩非之间的思想渊源。

1.4 研究意义



本论文的研究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点，希望通过找出《墨子》和《韩非子》的思想共同点，进而证明墨翟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韩非。现有的研究中，极少论文把《墨子》和《韩非子》两者放在一起比较。此外，有关两者的论文，更多的是谈“墨家”与“法家”，而非针对墨翟和韩非两人。因此，本论文希望此研究能够为更深入地处理墨翟与韩非两人之间的思想共同点，也希望借此能够找到“法”思想从《墨子》到《韩非子》的变化。胡适（1919，pg27）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么说：

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譬如一篇文章，那种学说不过是中间的一段。这一段定不要来无踪影，去无痕迹的。定然有个承上起下，承前接后的关系。要不懂他的前因，便不能懂得他的真意义。要不懂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这个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第二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

本论文认为要了解韩非思想的意义，需要看《墨子》的思想内涵。反过来看，透过研究《韩非子》的思想内涵，也能够让人更明白墨翟思想在历史上的位置。墨翟和韩非出身时期虽然前后差距接近 170 年，但两人所处时代的依旧是动乱不堪的年代。此外，两人对“法”的概念上也有不谋而合的地方。因此，能够理清《墨子》与《韩非子》思想上的渊源，也将让人能更清楚地看出先秦时代诸子之间的关系。





最后，本论文也希望透过探讨《墨子》与《韩非子》能够以韩非对墨翟思想的继承、吸收与改造作为个案，来论证战国后期“百家合流”现象中的诸子如何继承前人思想。虽然有关战国百家合流的已有多人研究，但以墨翟与韩非作为个案来论证百家合流的研究似乎不多，因此本论文希望能以此研究来探析百家合流对战国后期诸子的影响。至于有关百家合流的相关研究，本论文将在后续章节中举例说明。

1.5 研究范畴

本论文的研究将以《墨子》与《韩非子》的文本分析为主。由于这两本作品产生于于约 2500 年前。因此，在进行文本分析时，所采用的注释版本非常重要。

本研究所采用的《墨子》版本将借鉴孙诒让的《墨子闲诂》。《墨子闲诂》是目前学界公认的权威校注版本。《墨子闲诂》所使用的内容主要来自 1445 年出土的名道藏本。此版本拥有汉代记录 77 章中的 53 章，其中 18 章已经遗失，无法考究。

至于《韩非子》，本研究采用的是陈奇猷的《韩非子新校注》。《韩非子新校注》里的内容主要来自于 1165 年出土的乾道黄三八郎版本。《韩非子新校注》拥有《韩非子》的 20 个章节内容。



本论文希望透过借鉴孙诒让《墨子闲诂》和陈奇猷的《韩非子新校注》这两本学界公认的权威书籍，能降低分析墨翟和韩非的思想内容时的错误诠释。为此，本论文所分析的墨翟与韩非的思想内容范畴仅仅定于此两本书籍之中。

另外，本论文不以“法家”思想或“墨家”思想为分析范畴，而注重于墨翟和韩非两人的原著内容，主要原因是本论文认为先秦是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大环境，单纯以“法家”思想或“墨家”思想来形容秦朝建立的社会，未免过于武断。刘绪义（2009，pg17-18）在其《先秦诸子发生学研究》认为，先秦时期并没有所谓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汉人为研究先秦诸子而进行的分类。另外，刘绪义以发生学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先秦诸子，认为先秦诸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也是中国文化的起源。（2009，pg17），因此，特意地划分学派无助于本论文探索墨翟和韩非之间的关系。此外，本杰明·史华兹（2001，pg173）也提出这样的说法：

当我们转向公元前 4 和公元前 3 世纪的“诸子百家”时便发现，仅仅依靠这样的一个路数，即把独立的思想流派整整齐齐地排成系列，就成为一桩很成问题的事情，尤其当他们被看成是互不相容的思路时更是如此。

关于这一阶段，大多数中国传统的观点源自汉代初期的学术史家，他们很喜欢这种方法。

综上所述，笼统地以学派划分“法家”和“墨家”无助于本论文探索韩非与墨翟的思想渊源，所以本论文才采取研究《墨子》和《韩非子》文本的方式。最

后，由于先秦时代距今久远，所以只能透过该文本来尝试以最真实的角度还原当时两大学者的思想，从而探索两人之间的思想渊源。